

# 日本史研究序说

沈仁安 著



香港社会科学出版社

HONG KONG PRESS FOR SOCIAL SCIENCES

# 日本史研究序说

沈仁安 著

、 / 2

香港社会科学出版社有限公司

2001 年 7 月

## 日本史研究序说

---

作 者 / 沈仁安

责任编辑 / 纪廷许

封面设计 / 郭 寅

---

发 行 人 / 韩方明

出 版 者 /  香港社会科学出版社有限公司

香港金钟道 89 号力宝中心第 2 座 2006 室

电话: 852 - 2526 5338

传真: 852 - 2536 9223

电邮: china\_ss\_quarterly@21cn.com

排 版 / 龙浩国际交流出版公司电脑排版中心

印 刷 / 龙浩中国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 2001 年 7 月香港初版第一次印刷

I S B N / 962 - 620 - 037 - 5

定 价 / 港币 120 元

---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Printed in Hong Kong

## 序 言

### ——我国第二代日本史研究者的 探索与奉献

我国三百余名日本史研究者,大致可以分成四代人。建国初期的拓荒者是为第一代。他们学术造诣深厚、日语水平高、国学功底相当扎实,又满怀热情地肩负起创建新中国日本史研究的历史重任,自然成为奠基人。北京大学的周一良先生、南开大学的吴廷绶先生、东北师范大学的邹有恒先生等著名学者,即为我国第一代日本史研究者梯队中的代表人物。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中期至六十年代初期加入我国日本史研究行列者,可称为第二代研究者。沈仁安教授即为其中一位;其余各位姓名,恕不一一列举。他们的青春时代是在解放后新制大学中渡过。马列理论的穿透力、系统的专业基本训练、基本研究能力的掌握和锲而不舍的钻研精神,是他们治学的法宝。他们在日本史研究集群中发挥承上启下的关键作用,功不可没,亦不可取代。

“文革”前夕或“文革”中大学毕业生者,可称为第三代后续部队。他们的中小学教育比较充分,在大学里也接受过不甚完整的专业训练,但很不幸地遭遇极“左”路线的磨难而中辍学业。对“文革”经历的反省与专业训练的再补课,是他们步入中年时的两大沉重的十字架。重压之下确实也压垮了不少人,以至英年早逝。然而,来自于创业信仰的使命感、迎头赶上的内驱力和“文革”结束后国际文化交流的宝贵机遇,又使他们在顽强打拼与剧烈的分化中,再经磨砺而渐有建树。

改革开放后入学攻读硕士、博士学位的研究生,可称为我国日本史研究的第四代生力军。他们生逢建国以来历届大学生最好的求学环境,有一张安静的书桌、五光十色的学术讲座、生动活泼的学术活动、数量日增的进口图书和译著、渠道多样的国际交流机会,等等。中小学教育的不足或参加实际工作后方觉读书少的学问饥饿感,使他们入学后则抓紧时间,拼命读书。外语优势、理论视野开阔、相对系统的专业训练以及赴国外留学的亲身体验,使他们迅速破颖而出,进入学术竞技场以展现风采。第四代研究者是我国日本史研究的希望所在。

或许是出于巧合,奉献给读者的本论文集在不同程度上体现了北京大学日本史研究四代人的共同努力。第一代研究者周一良先生,是论文集作者沈仁安教授四十年前的恩师,时而垂询论文集的出版事宜。第三代研究者宋成有教授受第四代研究者李文、刘金才、王新生、赵成国、纪廷许、陈文寿、唐利国、戴宇、湛贵成等九位捐助出版的博士生委托,于北京难耐的暑热中欣然命笔,涂鸦序言。当然,论文集之所以能出版的关键是第二代学者沈教授积累了大量学术成果,以供付梓。

《诗经·卫风》之《淇奥》有诗曰:

瞻彼淇奥,绿竹猗猗。

有匪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

瑟兮侗兮,赫兮咺兮,

有匪君子,终可谖兮!

诗文中“匪”同“斐”。译成现代汉语,大意是:“淇水弯弯,绿竹修长。有文采的君子,切磋琢磨。神色庄重,胸襟开阔,光明磊落,笔锋雄强。有文采的君子,终不可忘。”《淇奥》本是称颂卫武公人品文采的赞歌,今天拿来赞誉沈教授的人品文章,是取其古为今用之意。一年前沈教授按学校规定光荣退休,仍笔耕不止,继续指导着在读博士生,关注日本史、东北亚史的学科建设。论文集出版,

是对沈教授多年从事日本史研究之不辍探索与奉献精神的肯定。笔者同沈教授共事三十余载,始终执弟子礼而谊同师友,故在作序时援用《淇奥》,聊表心意。

沈仁安教授 1935 年 1 月生于江苏省常州市。1959 年 7 月毕业于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同年考入周一良先生门下,攻读日本史研究生学位。1962 年 9 月留校任教,历任北京大学历史学系世界史研究室主任,中国日本史学会副会长、名誉会长,北京大学日本学研究中心副主任、《日本学》主编,北京大学东北亚研究所学术顾问等行政专职或学术兼职。教学科研以日本史为中心,兼顾其他国别史、断代史。

自攻读日本史研究生学位至今,沈教授从事日本史教学科研工作凡四十余载,著述颇丰(详见〈附录:沈仁安先生论著目录〉)。此次收入论文集的文章,仅为 1978 年改革开放以来科研成果的一部分,计三十余篇。其他多篇关于日本近世德川时代史的学术论文,不久将作为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德川时代史研究丛书》的一部专著另发。收入本论文集的三十余篇涉及日本古代和近现代史等,若加归纳,涉足以下四领域:

(一)日本古代史领域的若干重大问题探讨。其中,包括探寻日本民族与列岛文化起源的学术论文《关于弥生文化的若干问题》、《“倭”、“倭人”辨析》、《〈汉书〉、〈后汉书〉倭人记事考释》、《日本文化论种种》等四篇;探讨邪马台国的学术论文《试论邪马台国的性质》、《关于邪马台国》、《魏国与邪马台国使节往来考》、《九州势力东迁说与王朝更替说》等四篇;考释古代日本统一问题的学术论文《关于前方后圆坟的起源问题》、《从前期古坟看大和国的形成》、《试论倭国统一的主体》、《略论倭国大王政权的性质》、《倭王武上表文考》、《倭五王遣使除授考》等六篇;关于四至七世纪中叶日本史的研究资料评介的《大化前代史史料述评》一篇;研究大和、奈良时代日本对外关系史的论文《四、五世纪日朝关系的若干问

题》、《早期日朝关系初探》、《唐日关系的若干问题》等三篇；专论大化改新的《“改新之诏”系原诏论》一篇。

在上述研究成果中，沈教授的学术贡献是：(1)普查中日韩三国史籍文献，并参照了中国回赠品、日本仿制品、考古出土文物的金石文，对古坟时代(四~七世纪)的基本特征进行了新的概括：古坟的出现及其变化反映了大化前代的社会状况和历史发展；弥生时代铁器传入日本，但尚未取代石器；五世纪是日本历史上的重要转折时期，新旧王朝频繁更替；前期古坟被葬者带有强烈的巫师性质；古坟是大陆因素与弥生因素结合的产物，等。(2)从社会状况、阶级构成和王权特征等三方面入手，论证邪马台国是带有普遍奴隶制性质的早期国家；从畿内古坟文化与北九州青铜文化的密切联系、大和(YAMATO)与邪马泰(YAMATAI)地名的异同、神武东征传说对史实的折射、铜铎与古坟文化的骤消骤兴、骑马民族征服说、王朝更替说等涉及考古学、古地名学、民族学、政治学等多角度出发，说明以邪马台国为核心的九州势力东进并征服畿内大和国，逐步统一日本，从而进一步丰富了邪马台国九州说的学术内容，推进了邪马台国研究的继续深入。(3)通过对倭五王时代史籍文献的详细考证，断定倭国统一于五世纪上半叶；统一历经三十年间的血腥杀戮而攻灭列岛上百余小国；指出，日本学术界那些鼓吹所谓“天皇权力的确立是由于其宗教权威和掌握先进文化，而使人们自然归服”的传统观点，显然不符合日本古代的历史事实；大王政权是比邪马台国专制色彩更加浓厚和更加成熟的王权形态；倭五王对中国南朝王权外交主要出于其巩固政权和维护统一的需要，对朝鲜半岛则坚持传统的干涉、进攻政策，两面外交政策的相互关系是借助中国王朝的权威，干涉、进攻朝鲜半岛。(4)从“改新之诏”与前后诸诏文体的比较、“改新之诏”与令文的异同、改新记事等角度出发，婉驳日本学者大化改新否定论，认为“改新之诏”系实存原诏，从而为我国学者对大化改新继续开展研究提供了有力

的支撑点。有关日本古代史的其他研究成果,因限于篇幅而不再评介,留待读者自己去思考判定。

(二)有关日本近现代史的若干问题的研究。由于改革开放后沈教授日本史研究的主阵地转移到古代史领域,因此日本近现代史的研究成果数量较古代史为少。收入论文集的,有独撰的《明治维新新论》、《经济低速发展时期的日本农政》与合写的《中国对日本倒幕维新运动的影响》、《日本侵华战争期间的诱降策略及其失败原因》等数篇。篇数虽然不多,却新论迭出。例如,就明治维新这一被反复研究的课题而言,沈教授独辟蹊径,从幕藩体制下将军拥有最高土地所有权的领主土地所有制、集权与分权相结合的政治制度、严格的身份等级制度、闭关自守的锁国制度等四个角度出发,强调要弄清明治维新之所以带有许多不同于其他国家资产阶级革命特点的根本原因,就必须分析作为明治维新最大的社会历史背景的幕藩体制问题。应该说,关于幕藩体制的上述四特点的概括,颇具新意。此外,对日本近代化的前提条件、开国的影响、倒幕派与戊辰战争的特征、维新进程比较顺利的原因、改革的曲折历程等问题的阐述,也不乏一针血之论。再如,在《中国对日本倒幕维新运动的影响》一文中,从鸦片战争对日本的预警作用、《海国图志》和《万国公法》等汉译西方书籍传入日本及其影响、中国沦为半殖民地惨状对日本维新志士的刺激等方面,论述了中国的影响问题,揭示了近代初期中日两国曾一度命运与共的客观历史事实。在总结日本侵华战争的历史教训时,沈教授着重分析了日本民族性格的双重性,即“一方面岛国人固有的闭塞性、狭隘性和排他性;另一方面是接近大陆的地理位置所形成的开放性、吸收性和宽容性”,“从双重性格中又滋生出劣等感和优越感这种互相矛盾的两面气质”,两者相互作用,“就不自觉地迸发出竞争意识、对抗意识和取而代之,以自己为中心的意识”;“这种意识很容易导致它走上对外侵略扩张的道路”,“日本所处的地理位置决定它对外扩张的



方向主要是亚洲大陆”。这种从民族性格方面来探寻日本军国主义侵略扩张的心理因素分析,为研究日本军国主义提供了新思路。

(三)有关日本史学史の述论。改革开放初期,思想解放的洪流冲跨了不少脱离实际的极“左”禁忌,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以后涓涓细流般的日本史研究立即形成高潮。兄弟院校和各地社科团体如万马奔腾,发论文、出专著,竞相占领日本史研究的滩头阵地。当此之时,周一良先生眼光长远地提出先打好基础,无须急于求成的正确主张。在沈教授的主持下,北京大学历史学系世界史研究室日本史组的同仁,埋头工作,从介绍“文革”前后中断的日本史学界研究动态做起,先后编辑了数十万字的基础性资料,集中力量研究日本史学史的演化轨迹,努力实现周先生的宏愿。

此次收入论文集的有关文章,即为当年沈教授为打好我国日本史研究基础而辛勤劳作的记录。这类论文计有:《近代日本的史学和史观》、《明治维新与日本近代史学》、《日本进步史学的发展与变化》、《日本史学新流派析》等多篇。此外,沈教授还将坂本太郎的《日本的修史与史学》译成中文出版。史学史是历史学演进过程的履历和病历,也是反映隐藏在某国史学者研究理论、立场、方法、选题背后规律的晴雨表。这种探寻以具体的课题研究为依据,同时又具有超越具体课题的宏观巨视性色彩。探寻而有所得并非易事,但为促进我国日本史研究的深入发展,再难也必须去做。沈教授的上述多篇论文,将近代明治维新到战后八十年代百余年间的各种主要史观和流派,如文明史学、实证史学、文化史学、社会经济史学、马克思主义史学、皇国史观、人民斗争史观、民众思想史观、民众史观、世界史观(东亚史观)、近代化论、数量经济史、社会史学(精神史学)等逐一加以评介阐述。上述论文分析各史观和流派产生背景,介绍其基本观点,评价其历史功过,将百余年间日本史学史的来龙去脉阐释清楚,作出了特色独具的贡献。

(四)有关我国日本史研究总体状况的把握和今后发展趋势的

展望。这方面的文章主要有:《近年来中国的日本古代史研究动态》、《开展日本史学史研究的几点意见》、《〈日本学〉编辑随感》、《〈日本学〉编辑点滴思考》等数篇。作为将学术生涯全部奉献给我国日本史研究的第二代学者,沈教授不仅潜心钻研自身感兴趣的研究课题,也关心发展我国日本史研究的全局性问题,而且由于日积月累,深思熟虑,能够对总体状况和发展趋势中的关键问题,如数家珍般地一一点明。在他的“意见”、“随感”、“思考”中,相信读者会发现沈教授对事物的观察与把握的力度,并更能体会到第二代学者对事业的执著和对真理不懈的追求精神。

沈教授上述研究领域涉及日本史研究的方方面面,范围甚广。这从一个侧面反映我国第二代日本史研究者治学的一个基本特点:功底深厚,视野开阔,实战的适应能力强,故能点面结合、游刃有余。若读者稍加留意,会发现日本古代史的论文占论文总量的半数以上,此无他,乃八十年代北京大学历史学系世界史研究室日本史组人员布局安排与学科建设的需要使然。

沈教授原本从事亚非近现代史、日本近现代史的教学科研工作。“文革”结束后,百废待兴。作为世界史研究室主任和日本史组组长,沈教授基于日本史组教师主攻领域分工更趋合理化考虑,安排当时三名主讲教师分别在古、近、现三断代史领域独挡一面。于是,他把自己的研究领域从日本近现代史移阵古代史,并迅速取得研究业绩,成一家之言而反响国际学术讲坛。例如,所著《倭国与东亚》出版后,日本学者冈本健一即著文评论沈著“委婉曲折地批评了我们日本人常常嵌入内心深处的夜郎自大意识”。笔者不久前到日本御茶之水女子大学图书馆参观,领路的古瀬奈津子教授特意指出排列在书架上的精装本《倭国与东亚》,对沈教授的学问表示钦佩。一般说来,专著出版后泥牛入海般地销声于学术界,大概是作者莫大的悲哀和寂寞。沈教授专著既出,却能在国际学术界、尤其是日本学术界引起反响,可谓治学者的成功。当然,这

成功并非仅仅是沈教授个人的荣誉,更是中国的日本史研究走向世界学坛的切实步伐。

那么,何以能够迈出切实的步伐呢?笔者以为对研究者来说,至少应做到下述三点:其一,学术主攻课题与国际学术界研究重点接轨。为此,必须克服不明最新研究动态、却关起门来自吹自擂的盲目性,从而找到供彼此开展对话的论题。其二,学术水准能达到或接近世界一流。为此,就要拒绝平庸和粗制滥造,出精品以拥有进行学术强强对话的实力。其三,在国际学术交流中,既立足于对等友好立场,也要立足于切磋学艺的竞争观念。为此,作为中国研究者则需坚持中国学派和学风,不能妄自菲薄地拾人牙慧,热心批发或转销外国研究成果,甚至汉语也“协和化”。实际上,保持浓厚的中国学术特色,方能引起对方的尊重而有助于激发双方进行对话的兴趣。以上三点,均为沈教授在治学中身体力行。

邻国日本,是值得中国学者进行全方位研究的国家。日本史的研究课题形形色色,几至眼花缭乱。以日本古代史为例,从文明黎明期的先土器时代到封建社会烂熟的德川时代,就至少有日本民族与国家的起源;从酋长(CHIEFTAIN)政权、大王政权到古代天皇制、武家政权等不同类型政权形态的演替;从公社制、部民制、庄园制到领主土地所有制、新兴地主土地所有制等经济基础结构的变迁;以及作为统治阶级的氏姓制贵族、皇室家族、武士豪强和作为被统治阶级的下户、部民、班田农民、庄民乃至百姓、町人等不同社会阶级或阶层的嬗化沉浮;列岛国家与半岛、大陆国家纵横捭阖和国际关系推移;神道、佛教、天主教、新兴民间宗教等宗教教义和分派的产生与发展;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的撞击与融合,社会风俗习惯的萌生与变型等若干课题值得着力研究,内容相当丰富。

在诸多的研究课题中,如何选择研究者个人的主攻方向和课题?这就有赖于研究者自身对研究对象的准确判断,取决于对选题份量的取舍。这种判断和取舍,无疑是研究者学术眼光与研究

能力的集中体现。这种体现需要理论思维的穿透力、扎实的专业功力、锲而不舍的钻研精神,而这些,恰恰为第二代研究者所具备,故能扬长避短,选定主攻方向与课题。以沈教授为例,收入本论文集的古代史研究成果,主要围绕日本民族与民族文化的起源、邪马台国、大和王朝统一及其对外政策、大化改新定性等若干重大问题展开。应该说,上述课题抓住了日本古代国家初建前后(按照日本学者的传统分期法,称其为“古代”)的要领和关键,体现了作者的治学眼光与功力。

主攻选题一旦确定,研究成果质量的高低优劣就要看作者如何选用新史料,提出新观点并建构新的研究框架了。此外,概念的准确、思维逻辑的缜密、文字运用的简洁顺畅,也是不可忽视的因素。而这些,又恰恰是沈教授治学之长。以1987年发表的《关于弥生文化的若干问题》为例,作者运用了当时在佐贺县唐津市茱畑遗址、福冈县福岡市板付遗址和二丈町曲田遗址、北九州市长行遗址和熊本县天水町斋藤山遗址等多处考古发掘的丰富资料,从稻作农业的西来与金属器物的传入等体现弥生文化本质特征的现象入手,有说服力地论证了作者提出的弥生文化为“大陆文化与绳文文化结合说”。值得注意的是,这篇论文引用日本学者研究成果十八种,有十三种出版于八十年代初期,其中又有七种为著文的前一年、即1986年刚出版的新成果,其他则发表于1980~1985年。在关注日本学者的最新研究成果的同时,作者也注意搜集中国学者的最新研究成果,引用了1984~1986年国内新发表论文中的新资料。不分中外学者,凡是最新成果均给予重视,而非厚此薄彼。这是沈教授治学的另一大特点。这种兼容并包的研究胸怀,比眼中只有外国学者,而将本国学者故意置之度外的乃至唬人的偏颇之举,显然高明得多。当然,作者欲搜集最新资料,就必须为此付出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因为沈教授无法利用北京大学图书馆的图书,只能每周数次骑着自行车往返于畅春园住所与北京图书馆之

间,冬寒夏暑,实属不易。

在教学科研或者在师生间讨论问题时,沈教授对概念的准确与否或思维的逻辑性如何,从不马虎。听讲人或对谈者经常因此在窘促张惶过后而茅塞顿开,感到受益不浅。概念和逻辑问题,事关从事人文社科研究者的基本素质,是研究者立足科学研究的两块基石。沈教授对人对自己,历来如此。在《九州势力东迁说与王朝更替说》一文中,作者针对部分日本学者把“统一的国家组织发端”和“完备的古代国家体制的形成”作为六世纪国家统一标志的看法,明确指出“国家统一”与“国家组织”是两个不同的概念;认为前者是指一个国家在一个中央政府统治下,没有地方分裂和割据的情况,后者是指一个国家的统治方式;结论是:“把两个概念混为一谈,以后者作为前者的标志,显然是不恰当的。”在《关于前方后圆坟的起源问题》,作者又针对有的日本学者将前方后圆坟分解为各个构成因素,分别加以探求的“分解探源法”提出质疑,认为此法“本身是否合理,似乎值得怀疑”;继而,又依据日本考古学者的发掘研究结论,认为弥生后期的墓制具有多样性,而古坟墓制从一开始就具有划一性,两者在整体上存在着明显的差异。因而,有理有据地指出“分解探源法”存在逻辑上的失误,尖锐地发问:“从整体上截然不同的东西中寻找个别因素的共同性,在逻辑上,不是没有意义吗?”

以上两例,仅信手拈来而已。其实,在收入论文集的多篇论文中类似的例子散见各处,这就有待细心的读者自己去发现和品味了。行文,则讲求概念准确、逻辑周密和遣词造句的洗练,这是第二代研究者著述研究的第三个特点,是谓治学严谨。说起来,人人都明白:只有缜密思维、明确概念的内涵和外延,并借助有冲击力度、一针见血的文字表述,方能将论题的内在逻辑逐层分割、娓娓道来,从而增强论文的震撼力与说明力。然而,知易行难。沈教授之所以能够做到这一点,其秘密在于:其一,注重理论思维的训练。

“师傅领进门，修行在个人”。这句俗语说明：作为研究生，课堂听讲固然重要，但自己去读书、思考，并注意培养个人的思维能力与表述风格，同样也很重要。在某种程度上，后者甚至是前者所不能取代的。这样说，并非是在为指导教师推卸责任，而是想强调研究生阶段与本科阶段（准确地说是本科一、二年级时）求学特点的不同。沈教授在读研究生时，很注意对明治维新进程的理论思考。一番苦读苦思之后，曾就明治维新前后的农民状况、社会矛盾及维新性质等问题求教周一良先生。师生对谈，议论风发。其后不久，周先生著文《日本“明治维新”前后的农民运动》、《关于明治维新的几个问题》以回答之，是谓教学相长的佳话。其二，反复考订、推敲史料，提炼观点。据笔者所见，沈教授在读书搜集史料时的具体做法是：为节约公家纸张，时常将获得的史料抄录在裁成巴掌大小的废旧用纸无字的一面；有了相当的积累后，用红笔逐条划出其关键部分；接着按思考要点，将史料渐次归口整理；最终用极少的文字点出该史料的价值或概括出一个观点。这种由广而精、由表层逐步深入到里层的史料分类排列、考订整理的过程与论题的酝酿思考相一致。建立在充足史料基础上的勤奋思考并不断加以提炼，最终大有所获。当然，这需要时间和集中精力，一门心思地坐得住冷板凳。其三，初稿既成，反复修改。沈教授著文，喜欢打成腹稿则一气呵成。记得1982年他仅用一周时间即写出两万余字的《近代日本的史学和史观》一文的初稿，并嘱笔者修改后联名发表。以笔者当时的学力，拜读尚可，焉论修改？其实，修改不过是出自沈教授为笔者提供一个发表论文机会的美意，更是在实战中为笔者补上毕业论文写作训练的一课。此后三年间，又通过多次联名发表文章，从改文章到修改论文提纲到只就论文主旨略加点拨，使笔者领悟文章写作之而奋笔成篇。应当提到的是：凡是笔者起稿于先、沈教授修改于后的文章，发表时的署名顺序也据此排列。这种提携之心而绝无掠美之意的治学品格，是尊重他人，也尊重自己。

说到指点学生用心尽意,可谓北京大学日本史研究方向授业传道的传统。二十多年前,笔者曾将写成的小文送给周先生审阅。待拿到文稿一看,周先生详述阅后意见,连标点符号的错误都一一指出,这实在令人感动。至于笔者在教学科研中遇到诸如“倭”字含义、万叶假名文体官方公文的翻译等疑难问题时,周先生总是查阅资料或译出原文,写成书面意见,耐心答复。那时周先生很健康,用笔道劲,竖行书写。每份笔复字条都可以说是周先生奖掖后学的实物记录,弥足珍藏。沈教授对笔者文稿的修改,一如周先生。总之,沈教授之于笔者的言传身教,如同当年周先生之于沈教授。这种关爱弟子学业成长以至亲自动手修改标点符号错误的悉心指导,应该作为治日本史、东北亚史教书育人的优良传统,继续发扬光大。

收入论文集的多篇文章还体现了沈教授等第二代研究者治学的第四个特点,即善于把握日本史研究的全局性问题。这种全局性的把握,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剖析在日本学术界影响深远的各种错误史观,如皇国史观。目前,右翼新编日本历史教科书问题闹得沸沸扬扬,自由主义史观成了众失之的。于是,作为自由主义史观歪曲历史、为军国主义侵略辩护的毒根皇国史观被揪出来示众,受到应有的声讨与批判。其实,早在二十年前,沈教授在《近代日本的史学和史观》一文中,已专辟一章,剖析批判皇国史观或曰天皇史观。沈教授认为皇国史观存在三个要害问题:其一,鼓吹极端的主观唯心主义,并以此来对抗唯物史观,为贩卖反动史观提供理论依据;其二,鼓吹荒诞不经的“国体”观念,即所谓“万邦无比”、“天壤无穷”、“万世一系”的天皇制统治,完全不顾事实,更谈不上历史的科学性;其三,为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张目,宣扬日本种族优越论和日本至上主义,与法西斯统治密切配合,在日本军国主义侵略亚洲的罪恶战争中起到了极其恶劣的推波助澜作用。在其后的日本古代史研究中,沈教授继续对皇国史观大张挞伐。例

如在1990年发表的《试论倭国统一的主体》一文中,认为由著名学者津田左右吉首创的“分解投影法”被用诸所谓神武东征的研究时,虽其本意在于证明神武东征是编造的传说,但由于未对东征传说进行研究,却着重研究传说如何被编造出来,结果难以同皇国史观划清界线。沈教授认为,应当证明所谓神武东征传说不过是邪马台国东征畿内历史的传说化、神话化,故治史者为消除皇国史观的迷雾,就应弄清邪马台国凭靠实力,通过血腥的征服战争,消灭大和国、入主畿内、统一倭国的事实,从而彻底否定宣扬皇权神授、天皇万世一系的皇国史观。此外,在若干场合,沈教授也多次呼吁中国学者应重视对皇国史观的剖析与批判。其意义,在皇国史观沉渣泛起,自由主义史观甚嚣尘上的今天,尤其给人以沉甸甸的分量感。

第二,对中国的日本史研究所应解决的问题和今后努力方向,成竹在胸。

在《近年来中国的日本古代史研究动态》一文中,沈教授认为中国的日本古代史研究有了重大发展,在日本文化源流、徐福东渡、大化改新、中日关系史等方面取得了许多成果。同时,也存在日本古代史研究后续乏人,研究受语言、视野和资料限制,以及尚未形成独自风格与体系等三个问题。文章发表于1992年,至今已过去九年。九年间,有些问题,如资料、语言等局限,通过国际文化交流有所缓解;独自风格与体系问题,则通过中国学者出版日本通史、断代史或专题史研究成果,逐渐形成以我为主的局面,展现了无限发展前景;但研究梯队的断档或后续乏人的问题,却比九年前更加严峻。

发展趋势喜忧参半。在治外国史、包括日本史在内,首先遇到的是引进与创新相互关系的处理问题。沈教授在收入论文集的《〈日本学〉编辑点滴思考》一文中,提出必须认清的四个误区问题。应该说,这些带有相当普遍性的问题,乃是将我国日本史研究推向



新阶段的四只拦路虎。在引进的问题上,沈教授认为目前尖锐存在的一大误区是“不结合中国国情”。其一种表现是留学日本则深受实证主义方法影响,也像日本导师那样只满足于弄清事实,至于进而还要探究其前因后果、时空关系等中国式研究方法却被扔在一边。因此,写文章往往“事实来龙去脉铺叙清楚,但深问几个为什么就得不到答案了”。别一种表现是“失语”现象,即失去自己的语言和思想。一些研究者“没有自己的理论、方法、概念、术语,用的都是别人的,即使批判别人也是在别人的框架中去批判别人”。在另一篇文章《〈日本学〉前言》中,沈教授明确地说:“不应照搬,不应人云亦云,做传声筒。历史证明,照搬、当传声筒只会扼杀创造性。”因而,他疾呼纠正“失语”现象,倡导建立既有中国特色又走向世界的日本学。

其他的三个误区,分别表现为:误区之一,“只从国内视角看创新”,即“从国内看似很新鲜,但从国际上看,不过是国外某种理论方法观点的翻版,并无新意。”沈教授对创新的标准作了如下说明:“没有真知灼见的所谓研究有悖于科学的真谛”,“只有在国际上也是发前人之未发的作品,才是真正的创新”。误区之二,“盲目轻信他人的结论”。沈教授认为:“日本学者长于实证”,但在“实证的背后隐藏着强烈的民族主义”时常影响合理、科学的判定;“美国学者善于思索”,“理论创新、体系创新不断”,但“有时为了构筑新理论、新体系而不惜抹杀相反的或不利于自己的事实,甚至拿没有事实根据或与事实正相反的推论、现象为根据”。他强调:“对待外国的理论、观点、结论,不能像鲁迅倡导的那样,采取拿来主义的态度,而要鉴别、验证,然后吸取其合理的科学的内核,再加上自己的创新,这样,我国的日本史研究才能走向世界,并立于不败之地。”误区之三,“创新似无是非之分”。沈教授认为,“科学、学术无国界,但有是非之分、真理与谬误之别,这是不能不注意的。”

创新,是每位攻读学位的研究生所昼思夜想的重要问题。一